

# 《陳君葆日記全集》人物訂誤一則

梁偉基

香港中華書局編輯出版部

## 前言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周佳榮教授在〈大時代的證言——陳君葆及其日記（1933-1949）〉一文中有以下一段話：

說句老實話，我對於曾經長期擔任馮平山圖書館館長的陳君葆先生，所知實在很少，更沒有留意他為香港以至中國的文教事業作過甚麼貢獻。直至1999年初，我在商務印書館與胡從經先生閒談，才知道世間上竟有陳君葆日記的存在，並保留了大量我夢寐以求（不過連自己都以為不可能會有）的記錄。<sup>1</sup>

據知，陳君葆長期有寫日記的習慣，開始於1920年代，以訖於1980年代初。他用來寫日記的日記簿多達一百冊，日記文字估計超過一千萬字。<sup>2</sup> 1999年，經整理後的《陳君葆日記》共兩冊，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始於1933年，止於1949年。直至2004年，一共七卷的《陳君葆日記全集》才正式面世，亦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始自1932年，止於1982年。這套日記全面地展示出香港從1930年代初至1980年代初的面貌，真實地記錄了這數十年間，香港在政治、社會、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變遷，因此，它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

本文主要討論《陳君葆日記全集》中經常出現的一位人物——「老楊」。據日記整理者的註釋，這位「老楊」就是曾任香港民生書院院長的楊士端。可是，經筆者翻檢日記在不同時間的記錄，這位「老楊」卻是另有其人。

## 陳君葆其人其事

陳君葆（1898-1982），出生於廣東省香山縣三鄉鎮平嵐鄉，號水雲樓主，著作有《水雲樓詩草》、《陳君葆詩文集》及《陳君葆日記全集》等，文章則散見於《華字日報》、《華僑日報》、《大公報》、《文匯報》等報刊。他11歲時隨祖父移居香港，就讀於皇仁書院，後來考進香港大學文學院。大學畢業後，他前往新加坡華僑中學任教，後來出任馬來西亞七州視學官。1931年9月，他從馬來西亞回到香港，1934年受聘於母校香港大學，1936年正式接任馮平山圖書館館長兼文學院教席。

在香港大學任職期間，陳君葆與許地山、馬鑑等著名學者，共同參與本地的社會活動，例如推動平民教育、普及市民大眾的文化知識。1937年7月7日，中國抗戰軍興，陳君葆積極參與宣傳抗日的活動。1941年2月，陳君葆更協助宋慶齡在香港籌組「保衛中國同盟」，以支援中國的抗戰大業。1941年12月25日，日軍佔領香港，陳君葆不但克盡己職，使馮平山圖書館內的藏書保存完好，避過被日軍查抄或燒燬的命運，並將在中環郵政局內貯存的一批政府檔案文件，例如生死註冊處的簿冊、高等法院的文件等，轉移至香港大學圖書館收藏起來。<sup>3</sup> 同時，他更收集了一大批重要資料和書籍。為此，英女皇於1947年頒授他O.B.E勳銜，以表揚陳君葆在戰時保護文獻的貢獻。

二戰結束後，陳君葆仍積極參與本地的社會活動。在馬鑑和陳君葆的鼓勵和幫助下，香港大學學生草擬了會章一分給校方，最終，當時的副校長施樂詩接見了學生，並同意中文學會復會。陳君葆先後擔任中文學會復會後第二屆（1948-1949）內閣副主席及第三屆（1949-1950）內閣、第四屆（1950-1951）內閣及第五屆內閣

(1951-1952) 主席。他於1957年擔任香島中學校董會名譽董事，後來出任華人革新協會第四至二十八屆副主席、第二十九至三十一屆主席。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陳君葆先後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委員、全國文聯委員、廣東省文聯委員等。1950年代，陳君葆更先後三次率領香港的青年學生及香港大學的英籍教授訪問北京，並兩次獲得當時的周恩來總理接見。

### 「老楊」之辨

在《陳君葆日記全集》中，特別是1932至1940的八年間，陳君葆經常提及一位叫「老楊」的朋友。

他在日記中首次提及這位老楊，是1933年元旦的一段記載：

[1933年1月1日星期日] 這是一本日本人印行的日記。在這抵貨呼聲最高的當兒，老楊竟然拿這本東西送給我，而我又一點不遲疑地接受了它（十一月三日的事），也許有人說我們不愛國了。<sup>4</sup>

究竟這位老楊是甚麼人呢？根據香港商務印書館整理出版的七卷本《陳君葆日記全集》，整理者在上述記載提及老楊後加入一個註釋，指這裏的老楊就是曾任香港民生書院院長的楊士端。這個註釋無疑告訴讀者在日記中凡提及老楊的，均指楊士端。但整理者在1942年2月11日楊士端再次出現在日記時，又在楊士端後加入一個註釋，詳細介紹楊士端的生平。<sup>5</sup> 究竟兩人是同一人，還是另有其人呢？

筆者認為日記整理者將老楊理解為楊士端是錯誤的。試細心閱讀以下兩段在時間上相連的記載：

[1933年1月2日星期一] 老楊在香港似乎找不到可以談話的人，他極厭惡在這殖民地長大的華人，關於這點我

極表同情。老楊帶了兩位朋友來介紹互相認識，吳涵真又名亦生，和沈東壁。他們看過戲之後大家又談了好些時候才別去。涵真並拿出他的近作——刊在工商特刊「罵」的一篇，示給我們讀。他的文倒平平無奇只他的人倒很喜歡談論，有意味。他說目今中國是缺乏具有人格的人，所以總是弄不好，這很有見地。<sup>6</sup>

[1933年1月3日星期二] 昨天對吳楊兩君講過：中國究竟會不會亡這問題。現在實沒有去討論的必要。我們現在所要的是：即使中國明天便亡，也須去幹，拼命去幹。關於用甚麼方法去救這危亡的中國一層，涵真是主張用緩性的方法，以教育為基礎，炳吉主張要用急激的方法，便是暗殺也可以採用。<sup>7</sup>

我們將上述三段在時間上相連的記載放在一起解讀，就清楚看到陳君葆提及的老楊是楊炳吉，並非楊士端。楊炳吉就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的第一任經理。1933年1月20日星期五：「午到中華書局棣熙已上任了，我只怕他心志太高，不肯耐苦勞，致不能久於其任，則我又覺無以對老楊。」<sup>8</sup> 1933年7月22日星期六：「好幾天沒有和老楊見面，今天去訪他，抬頭看他寫字桌壁上掛的『商務』送來的一幀開張頌詞是『同舟之利』四個字，……」<sup>9</sup> 從「商務」、「同舟之利」的字眼，這幀頌詞可能是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所送贈的，而所謂「開張頌詞」所指似為中華書局香港分廠落成一事。楊炳吉在港廠竣工後，便調任港廠司理，所以此處的老楊為楊炳吉當無誤。1933年10月16日星期一：「到中華書局那裏去談天剛巧老楊也在，因向索取書櫥裏的銅佛與瓷道士，我本意不過是開玩笑的，實無意奪人之所好，但楊竟慷慨地着我拈去，我也只得領情了。」<sup>10</sup> 相信此人就是楊炳吉。另外，又有一段記載證明陳君葆是稱呼楊炳吉為老楊的，1935年10

月19日星期六記載：「午間到陶陶仙館吃點心，炳吉談起汪精衛的『沉着與沉悶』來。我說『這話的意思是對的，但以他的地位來講，汪是不配說這話的。弄成現在沉悶的局面是政府，叫大家不能夠沉着也沉着不來也是政府，汪還能夠配說這話呢』？這話提醒了老楊了。」<sup>11</sup> 可見老楊就是陳君葆對楊炳吉的稱呼。

事實上，陳君葆在日記中曾提及認識兩位楊姓的朋友。1937年12月29日星期三：「和健廬兩楊在思豪吃點心，炳吉說這次中日戰爭，……」<sup>12</sup> 這處的兩楊一位應為楊炳吉，另一位可能是楊士端。我們回顧1933年2月2日星期四的記載，陳君葆便告訴我們從一位楊姓友人認識到另一位楊姓友人，且看以下一段記載：

老楊一點打完電話來叫我如果有空到中華去兩三分鐘。剛登樓他介紹那位久想認識的另一位老楊。<sup>13</sup>

陳君葆在這日的記載，清楚告訴我們他認識的兩位楊姓友人：一位在這年2月2日前經已認識，另一位是2月2日當天才認識。這兩人極有可能就是楊炳吉及楊士端。究竟陳君葆當天才認識的是哪一位呢？筆者認為陳君葆當天才認識的應該是楊士端。首先，根據前面的分析，其中一位老楊是港局經理楊炳吉，所以當天打電話給陳君葆吩咐他前往中華書局的，應該就是楊炳吉。其次，根據陳君葆在1932年底的日記，他早在1932年已跟楊炳吉認識，且看以下一段記載：

〔1932年12月15日星期四〕「凡是詩人都愛貓」這大概是莫泊桑說的罷；我和炳劫〔吉〕在Boston喝茶的當兒看見一頭銀灰色的貓跑出來，禁不住滿口稱羨，我很自然地問侍者：這是公是母，侍者不即答卻嗤的一聲笑起來，引得那個弄咖啡的和堂內對桌幾個女子都一齊笑起來，我才莫名其妙！究竟大家笑的甚麼？炳劫也跟着笑。<sup>14</sup>

筆者在前文已經指出，陳君葆在日記中對楊炳吉有許多不同的稱呼，部份相信是手文之誤，「炳劫」便是其中之一。<sup>15</sup> 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陳君葆在1933年以前便已認識楊炳吉了。也就是說，他在1933年2月2日在港局認識的老楊就是楊士端了。

事實上，陳君葆的日記在1933年以前並沒有出現楊士端這個名字，但從1934年7月15日開始，日記中便十分頻繁地出現「士端」、「楊士端」的名字，而且其稱呼顯得十分有規則性，往往將老楊、楊士端的稱呼清楚分開。例如1934年9月27日星期四：「昨天老楊對我講，說士端有一種刊物託他轉交給我，但他爲了某種緣故不便帶來，要我親自去拿，同時寶彝也說他自己也不方便放在身邊，所以還是我自己去走一遭爲妙。」這段記載也說出老楊（楊炳吉）跟楊士端是認識的，進一步證明上述陳君葆在港局認識的老楊，就是楊士端了。陳君葆對他們稱呼的分別，除了避免混亂以外，似乎也透露出他對兩人交情深淺的一個說明。另一方面，這段記載很令人摸不着頭腦，是甚麼東西令他們如此不安呢？但只要稍稍了解楊士端的背景便可略知一二。其實楊士端是一位左派人士，甚至可能跟中國共產黨有某種聯繫。例如他曾介紹一位左派作家陳琪給陳君葆認識。我們再翻閱1942年的日記，在2月1日曾提及楊士端，整理者在此加入一個註釋，介紹楊士端的生平。原來楊士端在二十年代曾擔任陳獨秀的粵語翻譯；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與中共失去組織聯絡，後移居香港從事教育工作。這個註釋其實應該放在1933年楊士端剛在日記中出現的時候，但我們要到1942年的日記才清楚知道楊士端的身份與背景。因此楊士端交給陳君葆的東西，極有可能在當時來說是一些「反動」的資料，所以楊炳吉等人才這麼避忌。

## 結論

綜合以上的討論，筆者認為陳君葆在日記中提及的老楊應為港局經理楊炳吉，並非楊士端。而陳君葆大概是在1933年初透過楊炳吉的介紹才認識楊士端的。

**註釋**

- <sup>1</sup> 周佳榮，〈大時代的證言——陳君葆及其日記（1933-1949）〉，載《陳君葆日記全集》（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卷1，頁vi。（以下簡稱《日記》）
- <sup>2</sup> 周佳榮，〈大時代的證言——陳君葆及其日記（1933-1949）〉，頁vii。
- <sup>3</sup> 小思，〈一段護書往事——記陳君葆先生〉，載《陳君葆日記全集》，卷7，頁624-625。陳雲玉，〈爸爸陳君葆的一生〉，載謝榮滾主編，《陳君葆詩文集》（香港：三聯書店，1998），頁2。
- <sup>4</sup> 《日記》，卷1，頁29。
- <sup>5</sup> 《日記》，卷2，頁56。
- <sup>6</sup> 《日記》，卷1，頁29。
- <sup>7</sup> 《日記》，卷1，頁30。
- <sup>8</sup> 《日記》，卷1，頁32。
- <sup>9</sup> 《日記》，卷1，頁49。
- <sup>10</sup> 《日記》，卷1，頁56。
- <sup>11</sup> 《日記》，卷1，頁198。
- <sup>12</sup> 《日記》，卷1，頁355。
- <sup>13</sup> 《日記》，卷1，頁34。
- <sup>14</sup> 《日記》，卷1，頁26。
- <sup>15</sup> 陳君葆在日記中經常有手文之誤的情況發生。例如將高文鐸寫成「高民鐸」、健廬寫成「健老」、陸費伯鴻寫成「陸貴伯鴻」、犬養毅寫成「太養毅」等。
- <sup>16</sup> 《日記》，卷1，頁117。
- <sup>17</sup> 《日記》，卷1，頁463。香港萬里書店創辦人同樣叫陳琪，於1959年與其他友人創辦萬里書店，未知即是否為日記中提及的陳琪，待考。參見《半世紀風雲：專訪香港書業翹楚》（香港：世界出版社，2004），頁197。
- <sup>18</sup> 《日記》，卷2，頁56。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主辦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 合辦

##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講座系列

### 第四十一講

主講：

蘇利文教授（Prof. Michael Sullivan）

牛津大學凱瑟琳學院榮退院士

### 第四十二講

主講：

郭靜雲教授

俄羅斯國家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研究員

中山大學歷史系候任教授

### Some Reflections on Art and History

日期：2007年5月26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7:00-9:30

地點：中山大學永芳堂二樓講學廳

### 由考古資料探討神龍信仰

日期：2007年7月23日（星期一）

時間：晚上4:00-6:00

地點：中山大學永芳堂三樓講學廳